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三重困境与破解路径研究

盛 涵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3月23日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与人口老龄化进程深度交织, 农村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制约乡村全面发展的核心结构性矛盾。本文基于2020~2025年相关实证研究与统计成果, 以“问题-成因-路径”为核心逻辑, 系统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乡村空心化、生产效能受限、养老保障失衡三重核心问题。结合城乡二元结构理论、要素配置理论等学术视角深入剖析成因后发现, 农村人口老龄化通过人口外流引发资源闲置进而导致乡村活力衰退, 通过劳动力素质短板阻碍技术应用进而延缓产业升级, 通过养老需求增长与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放大保障缺口。基于此, 从破除城乡二元壁垒、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三个维度提出针对性对策, 为实现农村人口老龄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农村人口老龄化, 乡村空心化, 劳动力供给, 养老保障, 破解路径

A Study on the Triple Predicament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Rural Areas and Their Solutions

Han S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February 7, 2026; accepted: March 13, 2026; published: March 23, 2026

Abstract

The strategy of rural vitalization is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has become a cor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restric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Based on relevant empirical studies and statistical results from 2020 to 2025, this paper takes the logic of “problems-causes-paths” as the core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ree

major issues triggered by rural population aging: rural hollowing-out, constrained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unbalanced elderly care security.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auses from academic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theory and the factor allocation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rural population aging leads to the idleness of resources and thus the decline of rural vitality through population outflow, hinders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thus delays industrial upgrading due to the shortage of labor quality, and amplifies the security gap throug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rowing demand for elderly care and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related services. On this basis,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breaking down the urban-rural dual barriers, promoting industrial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improving the elderly care security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population aging and rural vitalization.

Keywords

Rural Population Aging, Rural Hollowing-Out, Labor Supply, Elderly Care Security, Solution Path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显著的“城乡倒置”特征,农村地区老龄化速度更快、影响更深,形成“45岁以上群体占比超60%”的年龄结构格局,且老龄化率增速在近十年明显加快[1]。这一人口结构变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诉求形成尖锐矛盾:乡村振兴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源、高效的生产体系与完善的民生保障,而农村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系列问题正持续削弱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2]

现有研究已围绕农村老龄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展开诸多探索,覆盖养老服务供需、劳动力结构影响、农业生产效应、保障体系优化等多个维度[3]。研究普遍指出农村老龄化面临劳动力短缺、养老服务不足、产业发展乏力等突出问题,也提出了多元化应对思路,但整体来看,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问题或单一解决方案,缺乏对“问题-成因-对策”逻辑关联性的系统挖掘,对多重问题的协同治理关注不足,难以形成全方位的治理框架。[4]

从实践层面而言,农村老龄化引发的乡村空心化、生产效能下滑、养老矛盾凸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梗阻。因此,本文在整合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剖析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三重核心问题及其形成成因,构建科学有效的破解路径,不仅能够丰富人口老龄化与乡村振兴交叉领域的研究体系,填补现有研究在机理分析与对策靶向性方面的不足,更能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参考,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老龄化背景下落地见效,实现农村“健康老龄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5]

2. 农村人口老龄化产生的问题分析

2.1. 乡村空心化加剧

乡村空心化是农村人口老龄化最直接的衍生结果,呈现人口、产业、设施、文化的全方位空心化蔓延态势,严重动摇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源根基与内生发展活力[6]。在城乡发展差距的驱动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城镇单向流动,导致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极端失衡状态,留守群体以老年人口为核心、妇女和儿童为补充,形成典型的“留守型”人口格局,直接引发乡村“人才断层”的结构危机。基层治

理层面因缺乏年轻力量注入而陷入创新乏力的困境,产业发展因缺失复合型带头人而难以突破传统路径,传统农耕技艺、民俗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丧失年轻传承群体而面临失传风险,乡村文化认同感与凝聚力持续弱化。

其中,产业层面,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导致农村产业发展失去核心人力支撑,传统农业因劳动力短缺难以推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土地撂荒现象在偏远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农业生产效率长期处于低位[7]。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本就基础薄弱,加之缺乏具备市场意识、创业能力的青壮年人才,农产品加工多停留在初级加工阶段,附加值偏低;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因缺乏专业运营与技术支撑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导致农村产业结构长期呈现“一产独大、二产薄弱、三产滞后”的单一化格局,进一步强化了人口外流的推力,形成“人口外流-产业衰退-人口进一步外流”的恶性闭环。此外,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人口规模变化的适配性不足,随着青壮年外流与人口总量减少,部分村级小学、卫生室、文化活动中心等设施因服务人口不足而陷入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不仅造成公共资源浪费,更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持续下降。基础设施维护因缺乏资金与人力支撑难以有效开展,道路、水利等设施老化问题突出,乡村的生产生活功能逐步衰退,进一步削弱了农村对人口的吸引力,加剧了空心化程度。[8]

2.2. 生产效能受限

生产效能受限是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制约,集中表现为劳动力供给质量与产业发展需求的结构性错配,严重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与农村产业转型升级[9]。随着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老龄劳动力已成为农业生产的绝对主力军,但受生理机能衰退影响,其体力与精力难以承担深耕细作、抢收抢种等高强度农业劳动,导致农业生产普遍呈现“粗放经营”特征——田间管理精细化不足、病虫害防治不及时等问题突出,直接影响农业产出效率[10]。更关键的是,农村老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知识结构老化,对无人机植保、智能灌溉、精准施肥等现代农业技术的接受度与应用能力较弱,使得农业技术推广面临“劳动力接受难、落地难”的双重阻力,农业生产难以实现“提质增效”的转型目标。尽管部分粮食主产区通过机械技术替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介入等资本深化手段实现了粮食增产,但这一效应在欠发达地区、非主产区表现不明显,从整体来看,农村人口老龄化仍通过增加碳排放、制约技术创新等路径,对农业生态效率形成显著抑制。[11]

在产业升级层面,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直接导致复合型人才供给断层,成为制约农村产业融合与新业态发展的关键瓶颈[12]。农产品加工领域因缺乏技术研发与品牌运营人才,多数企业停留在清洗、晾晒、简单包装等初级加工阶段,产品附加值低,难以形成市场竞争力;乡村旅游因缺乏专业的运营管理与产品设计人才,多以“农家乐”、“采摘园”等单一形式存在,服务质量与体验感不足,市场吸引力有限;农村电商则因老龄劳动力对互联网技术、直播营销等新型模式的适配性不足,优质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渠道不畅,难以对接广阔的城市消费市场。此外,劳动力老龄化还引发生产要素配置的连锁失衡:老龄劳动力对土地流转的意愿普遍偏低,导致土地资源长期处于分散经营状态,难以发挥规模化生产的规模效应[13];而农村产业发展的滞后性又使得资本投入缺乏盈利预期,金融机构涉农信贷支持意愿不足,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难以形成协同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产业振兴的难度。[14]

2.3. 养老保障失衡

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养老服务需求增长,而养老保障体系存在的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保障水平偏低等问题,难以满足老年群体多元化需求,形成结构性矛盾。农村养老机构数量少、规模小,每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远低于城镇水平,村级互助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足,部分偏远村庄甚至没有

养老服务设施[15]。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数量少、专业素质低，难以提供专业化的生活照料、健康护理等服务。从供给结构来看，农村养老服务呈现“重生活照料、轻健康护理与精神慰藉”的特征，难以匹配老年人口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的需求，健康护理、康复理疗、精神慰藉等个性化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老年群体精神孤独问题普遍存在[16]。在保障制度方面，农村养老保障呈现“碎片化”特征，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缺乏有效衔接[17]。养老保险养老金待遇水平偏低，医疗保险报销比例低、范围有限，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尚未全面建立，异地就医结算不便，长期护理费用缺乏有效保障，进一步加剧农村老年人口生活困境。[18]

3. 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成因

本文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与要素配置理论展开成因剖析。城乡二元结构理论聚焦城乡制度性分割引发的发展差距与要素单向流动问题，是解释农村人口外流与空心化的核心理论框架；要素配置理论的核心观点为，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是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要素配置的结构失衡与流动壁垒，会直接造成生产效率损失、产业发展动能不足，而城乡间要素的非均衡配置，正是农村人口老龄化诸多衍生问题形成的核心经济机理。

3.1. 城乡二元结构固化

城乡二元结构固化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外流、乡村空心化加剧的根本性制度成因，其核心症结在于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制度性壁垒尚未完全破除，资源配置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失衡，最终形成“城市吸附、农村失血”的单向人口流动格局。尽管户籍制度改革已历经多年推进，逐步打破了城乡户籍的身份界限，但户籍背后附着的公共服务权益绑定关系仍未彻底改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在城市落户门槛、子女义务教育入学资格、保障性住房申请、异地医疗报销便捷性等方面，仍面临诸多隐性限制，难以实现家庭整体迁移。这种“半城镇化”状态，使得农村劳动力只能孤身前往城市务工，家中老人、妇女和儿童被迫留守，直接导致农村留守老年群体规模居高不下，进一步加剧了乡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失衡，为空心化加剧埋下隐患。

收入分配的城乡落差，是驱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直接经济动力，也是城乡二元结构在经济层面的集中体现。农村地区长期以传统农业为主导，农业生产模式集约化程度低、产业链条短，农产品多以初级产品形式出售，附加值偏低，农业生产收益率长期处于低位，难以满足农村青壮年对收入增长和生活改善的需求。与之相反，城市二、三产业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充足的就业岗位、健全的薪酬激励机制，能够为劳动者提供更高的收入回报和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形成了强烈的虹吸效应。在理性经济选择的驱动下，农村青壮年纷纷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务工，导致农村劳动力持续“失血”，乡村发展逐渐失去核心人力支撑。

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城乡失衡，进一步强化了人口外流趋势，加剧了乡村空心化的恶性循环。长期以来，优质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受城乡发展定位和资源分配政策的影响，持续向城市集中，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呈现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布局不均的双重短板。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陈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设备不足、专业医护人员短缺，公共文化设施覆盖率偏低、服务内容单一，难以满足农村居民对优质公共服务的需求。为了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自身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农村居民纷纷向城市迁移，形成“为公共服务而迁移”的趋势。而农村人口的持续减少，又导致本地公共服务设施利用率大幅下降、运营维护资金短缺，进而引发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萎缩，形成“人口外流 - 公共服务衰退 - 人口进一步外流”的恶性闭环，持续加剧乡村空心化程度，阻碍乡村振兴进程。[19]

3.2. 产业发展滞后与要素错配

产业发展滞后与生产要素配置失衡，是导致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加剧、生产效能长期受限的核心经济成因，二者相互交织、相互制约，共同弱化了农村产业的竞争力与就业吸纳能力，进一步固化了农村劳动力的不合理结构。产业发展的滞后性导致农村难以提供有吸引力的就业岗位与收入回报，倒逼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而要素配置的失衡又进一步制约产业升级，形成“产业滞后-要素流失-产业更滞后”的不良循环，最终让老龄劳动力成为农业生产的绝对主力。[20]

农村产业发展滞后的问题尤为突出，且呈现结构性失衡特征。农村经济长期以传统农业为主导，农业生产多以小农户分散经营为主，规模化、集约化程度偏低，缺乏标准化生产体系与品牌化运营理念，农产品多以初级产品形式进入市场，附加值不高，难以形成稳定且高效的收益产业链，无法支撑农村居民实现收入大幅提升。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基础薄弱、进程滞后，农产品加工企业多为小型作坊式经营，生产规模小、技术水平低，深加工能力不足，难以将本地农业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兴产业虽有发展潜力，但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专业的运营管理能力与人才支撑，未能形成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态势，难以发挥对青壮年劳动力的有效吸纳作用，最终导致农村就业岗位供给不足、质量不高，青壮年劳动力只能选择向城市迁移。

生产要素配置的单向失衡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产业发展的困境。城乡要素流动长期呈现“单向集聚”特征，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生产要素受城市虹吸效应影响，持续向城镇集中，农村地区面临严重的要素供给短缺困境。资本层面，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金融机构对农村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不足、门槛偏高，信贷产品适配性不强，导致农村产业发展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撑产业升级与规模扩张。技术层面，农村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健全，技术推广队伍力量薄弱、专业素质参差不齐，推广方式较为传统，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导致无人机植保、智能灌溉、绿色种植等先进农业技术在农村推广应用缓慢，无法有效弥补老龄劳动力的技能短板。人才层面，农村缺乏完善的人才吸引、培育与激励机制，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外流导致农村人才严重短缺，而城市人才向农村回流的渠道不畅，缺乏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与发展空间，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匮乏，直接制约了农村产业的技术创新与转型升级，进一步降低了农村产业的生产效能。[21]

3.3. 制度供给不足与保障体系薄弱

制度供给不足与保障体系薄弱，是导致农村养老保障失衡的关键症结，二者相互关联、互为制约——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导致保障合力难以形成，而服务供给的薄弱又进一步放大了制度短板，最终使得农村老年人口的多元化养老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加剧了农村养老领域的供需矛盾。这一问题不仅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更制约着乡村民生福祉的提升，与乡村振兴的核心诉求相悖。[22]

制度供给不足的核心表现为养老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与保障水平的“低端化”，难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合力。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主要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构成，但各类制度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呈现“各自为政”的碎片化格局，未能实现保障资源的统筹整合。其中，农村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模式，但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缴费能力有限，加之村集体补助能力薄弱，导致养老金待遇水平长期处于低位，难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开支。医疗保险方面，报销比例偏低、报销范围有限，门诊慢性病报销额度不足，且与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缺乏衔接，异地就医结算仍存在诸多不便。更为突出的是，农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尚未全面建立，对于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而言，高额的护理费用缺乏有效保障，给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进一步凸显了制度供给的短板。

保障体系薄弱则集中体现在养老服务供给机制不健全与资源配置不合理两个方面。在服务供给机制上,农村养老服务呈现“政府主导不足、市场参与不够、社会力量缺位”的尴尬局面,多元协同的供给格局尚未形成。政府财政对农村养老服务的投入有限,资金分配不均衡,难以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需求,尤其是偏远村庄的养老服务投入严重不足。市场力量因农村养老服务市场规模小、盈利空间有限、运营成本偏高,参与积极性普遍不高,缺乏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企业和机构入驻农村。社会力量参与渠道不畅,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等未能形成有效的补充力量,养老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难以提升。在资源配置上,农村养老服务资源呈现明显的不均衡分布,优质养老服务设施主要集中在县城及中心乡镇,偏远村庄的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极低,部分村庄甚至没有基本的养老服务场所。同时,资源配置与老年人口的实际需求严重不匹配,现有养老服务多以基础生活照料为主,缺乏针对老年人口的健康护理、康复理疗、精神慰藉等个性化服务,难以实现养老服务的精准供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养老保障的失衡状态。[23]

4. 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路径

4.1. 破除城乡二元壁垒, 推动人口回流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固化难题,核心在于破除制度性障碍、优化资源均衡配置,以系统性制度改革与特色产业培育为双轮驱动,推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有序回流,重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从根源上遏制乡村空心化蔓延,实现人口流动与乡村振兴的良性耦合[24]。这一实践需立足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导向,精准对接劳动力回流的核心诉求,兼顾政策适配性与产业可持续性,构建“留得住人、用得好人”的乡村发展生态。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夯实人口回流的制度支撑。取消城乡户籍身份界限,建立全国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简化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审批流程,保障农村居民在城市平等享有落户、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权益。完善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配套支持政策,强化就业技能培训、岗位信息推送、劳动权益保障等服务供给,同时优化子女义务教育入学保障、保障性住房供给、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等关联举措,推动农村劳动力家庭整体迁移,有效缩减留守老人群体规模。同步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加大农村教育、医疗、文化、交通、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入,重点补齐村级学校师资力量、基层卫生室诊疗设备、乡村文化活动阵地等供给短板,持续缩小城乡公共服务质量差距,让农村居民在本地即可享受与城市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从根本上弱化人口外流的推力。

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培育特色产业吸纳人口回流。破除城乡要素单向流动的制度障碍,建立“城市反哺农村、要素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格局,引导城市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生产要素向农村精准下沉。资本层面,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加大金融机构涉农信贷投放力度,降低涉农信贷门槛、创新适配性信贷产品,设立农村产业发展专项扶持基金,为返乡创业主体提供创业担保贷款、税收减免、场地补贴等多元化支持,破解创业资金瓶颈。技术层面,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搭建城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农村产业主体的技术合作平台,推动现代农业种植养殖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数字农业技术向农村场景转化应用,提升农村产业技术装备水平。以县域为基本单元,依托区域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重点培育特色种养业、农产品精深加工业、乡村文旅产业、农村电商等富民产业,打造“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格局;加快农村产业园区建设,培育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价值链,创造多元化、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提供“就近就业、本地增收”的实践路径,赋予劳动力回流足够的吸引力与可持续性。

4.2. 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强化生产支撑

以农村产业提质增效为核心导向，立足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现实，通过农业生产适老化改造、技术创新赋能、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三维发力，破解生产效能受限难题，构建与老龄化趋势相适应、与乡村振兴要求相契合的现代农村产业体系，强化乡村振兴的产业支撑动能[25]。这一实践需兼顾老龄劳动力的生产适配性与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老龄劳动力有效参与、产业能级持续提升”的双重目标。

聚焦老龄劳动力生产适配性，推进农业生产适老化改造与技术下沉。针对农村老龄劳动力体力有限、技能结构单一的特征，重点发展适老型农业，系统性推广轻型化、机械化、智能化农业技术与装备，从生产端降低劳动强度、提升作业效率。研发推广操作简便、安全性高的小型农业机械，覆盖耕种、播种、植保、收割等关键环节；构建全域覆盖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老龄劳动力提供“菜单式”“托管式”全程服务，有效降低其生产经营压力。同时，推行需求导向型数字化技能培训，围绕现代农业技术应用、小型农机操作等核心内容开展精准化培训，提升老龄劳动力的现代农业适配能力。

以规模化经营与要素协同为抓手，推动农村产业能级跃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流转市场交易规则与风险保障机制，引导老龄劳动力有序流转土地经营权，推动土地资源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实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培育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支持其采用先进技术、打造农产品品牌，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大农村产业资本投入，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创新涉农信贷产品，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困境；建立农村人才培育与引进机制，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和针对性扶持政策，填补产业人才缺口，以资本、人才、技术的协同赋能，推动农村产业实现全方位变革。

4.3. 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提升服务能力

以满足农村老年人口多元化、多层次养老需求为核心，通过制度体系健全、服务供给优化、多元主体协同三维发力，破解农村养老保障失衡困境，构建与人口老龄化趋势相适应、与乡村振兴要求相匹配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全面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与可及性，夯实农村民生福祉根基。[26]

构建多层次、一体化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破除制度碎片化壁垒。优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提高政府财政补贴标准，增设灵活多样的缴费档次，建立养老金待遇动态调整机制，适度提升基础养老金水平，增强制度保障力度。深化城乡医疗保险制度整合，统一报销政策、扩大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简化异地就医结算流程，实现城乡医疗保险待遇均等化，减轻农村老年人口医疗负担。加快建立农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全面纳入保障范围，明确护理服务标准与费用报销比例，有效缓解长期护理经济压力。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养老保障衔接机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老年人口全部纳入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筑牢养老保障底线。同时，深化“家庭-村社-机构”三级联动养老服务网络建设，优化服务供给结构。强化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通过出台赡养激励政策、发放养老护理补贴、宣传孝老爱亲传统等方式，引导子女履行赡养义务，夯实家庭养老功能。推广规范化村级互助养老模式，明确互助养老组织运行标准，建立资金保障、服务对接、风险防控机制，丰富日间照料、助餐助浴、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服务内容，提升互助养老服务实效。提升农村养老机构专业化水平，扩大养老床位供给，重点加强医疗护理设施建设与专业人才培养，推动养老机构与乡镇卫生院、村级卫生室深度合作，实现医养结合全覆盖，满足老年人口健康护理需求。

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供给长效机制，强化服务保障能力。强化政府财政投入与政策引导责任，将农村养老服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建立稳定增长机制，重点支持农村养老设施建设、专业人才培养、特殊老年群体补贴等。激发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活力，通过税收减免、场地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等政策工具，引导企业、社会组织投资建设农村养老服务设施，提供专业化、

个性化养老服务。搭建农村养老志愿服务平台, 培育养老志愿服务队伍, 鼓励返乡青年、村干部、医护人员等参与志愿服务, 为农村老年人口提供生活照料、健康咨询、精神慰藉等公益服务, 形成多方发力、协同赋能的农村养老服务发展格局。

5. 结论

农村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乡村空心化加剧、生产效能受限、养老保障失衡三重问题, 已成为制约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阻碍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这三重问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形成“人口外流-产业滞后-养老失衡”的恶性循环, 其形成是城乡二元结构固化、农村产业发展滞后、制度供给不足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破解这些问题, 需要坚持系统思维, 构建“问题-成因-对策”一一对应的靶向治理框架, 从破除城乡二元壁垒、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三个维度协同发力。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培育县域特色产业, 推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回流, 破解乡村空心化问题; 通过发展适老型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优化生产要素配置, 提升农村生产效能, 强化产业支撑; 通过健全养老保障制度、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强化多元主体参与, 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 满足老年人口多元化需求。

未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与人口老龄化政策的不断完善,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三重问题将逐步得到缓解, 但农村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现象, 其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后续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具体区域的实证案例, 深入探究不同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差异化特征与成因, 提出更具针对性的破解路径; 同时, 可加强对农村“生产性老龄化”“适老型农业”“互助养老模式”等新兴领域的研究, 为农村人口老龄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提供更多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唯有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才能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机遇, 实现农村“健康老龄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 [1] 都阳, 崔慧敏. 农村人口老龄化: 趋势、挑战与应对策略[J]. 中国农村观察, 2025(4): 3-17.
- [2] 朱军.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老龄化研究: 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 现代商贸工业, 2025(18): 16-18.
- [3] 李宗才.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研究及对策[J]. 科学社会主义, 2007(6): 120-122.
- [4] 贺雪峰. 应对农村老龄化的中国方案[J]. 贵州社会科学, 2024(9): 133-144.
- [5] 闫钟, 王居源. 健康、保障与参与: 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策略[J]. 经济问题, 2025(8): 113-120.
- [6] 罗会, 李兴勇, Phidsavard Keomeesa, 陈玉保, 张伟.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人力资源困境与对策研究[J]. 山西农经, 2025(21): 40-43.
- [7] 高洪洋. 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J]. 农村经济, 2012(12): 95-99.
- [8] 卢成会, 祝坤.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趋势问题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25(9): 1-11.
- [9] 胡新艳, 黎燕玲, 陈相泼. 危机还是机遇: 中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与粮食生产[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5): 24-34.
- [10] 刘睿卓. 乡村振兴下老人农业的生存逻辑、经济功能与发展路径[J]. 农业经济, 2024(12): 90-91.
- [11] 赵毅, 高瑞. 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5, 46(6): 1149-1161.
- [12] 崔宁波, 王斯曼, 董晋.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生产韧性的影响——基于倒逼视角的中介效应[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5, 46(2): 237-247.
- [13] 穆怀中, 张冬雪. 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粮食安全: 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3(6): 61-75.
- [14] 王兆林, 王莹莹, 吕秋杭, 吴月.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4, 23(2): 160-169.

-
- [15] 董云蒂, 沈兰. 乡村振兴下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的困境、模式及路径[J]. 农业经济, 2025(8): 86-88.
- [16] 朱铭嫻, 李晰晰.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现状、需求与供给研究综述[J]. 山西农经, 2025(16): 94-96, 103.
- [17] 梁文凤.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经济纵横, 2022(10): 82-88.
- [18] 苏保忠, 张正河.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的困境及其路径选择——基于安徽省砀山县的实证分析[J]. 改革与战略, 2008(1): 67-69.
- [19] 蔡淑琴. 老龄化视域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研究[J]. 农业经济, 2025(12): 92-95.
- [20] 曹佳玉.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政策的问题与对策[N]. 劳动时报, 2025-08-13(003).
- [21] 徐亚东, 林进龙, 张应良. 农村生产性老龄化: 理论阐释、现实约束与优化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 2025(7): 63-82.
- [22] 胥英明. 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农村养老对策[J]. 理论与改革, 2013(5): 82-83.
- [23] 张国庆. 优化农村养老保障服务体系之策[J]. 村委主任, 2025(5): 143-145.
- [24] 任亮亮, 贺雪峰. 迈向村社养老: 农村老龄化问题应对模式比较与优化路径[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2(1): 40-49.
- [25] 王海娟. 面向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 适老型农业视角[J]. 理论月刊, 2025(3): 124-133.
- [26] 屈振辉, 彭利娜, 谭乐坤.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养老的需求、模式与优化路径[J].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学报, 2026, 38(1): 66-75.